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全　磊,陈玉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有序 Logit 模型,利用 2016 年湖北新洲区和襄州区 225 个农地转出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前,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已经存在,土地流转使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位序差异发生改变,其他资本的位序差异保持不变;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低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上流动,而高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下流动;带动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的因素包括打工型生计策略、兼业型生计策略及位于省会近郊的有利位置;非劳动型和务农型农地转出户受到土地流转初期的生计资本禀赋约束,无法选择更有利于生计总资本流动的生计策略。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创造非农就业环境、培育新型主体等加强农户生计资本促进生计转型的建议。

关键词　土地流转;农户;可持续生计;生计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F 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8)02-0127-09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8.02.016

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带来了日益普遍的土地流转现象,越来越多的农地转出户面临着生计转型,他们能否顺利完成生计转型事关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进程和农村社会安定。已有研究论证了农地流转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交易收益效应、效用替代和冲击缓和作用[1-3],揭示了当前农地流转的制度安排并不以直接改善农地转出户的家庭福利为目标,而是期望通过农地流转机制发挥作用,由农户自发进行农地经营权的再分配,以实现家庭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并完成家庭生计转型。但是,仅靠农地转出户自身的力量完成生产要素配置和生计转型是有难度的,需要辅助以有效的干预政策。这就需要了解土地流转导致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及生计状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哪些因素影响了农地转出户生计状况的不同变化趋势。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现有研究关注了土地流转对农地转出户家庭收入、家庭福利,以及生计资本状况的影响。一方面,多数研究认为土地流转有利于农地转出户收入增加[4-10],但也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对农地转出户收入影响并不显著[11];游和远等和郭斌等的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框架对农地流转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有利于农地转出户收入增加,但对家庭成员健康、社会联系的改善没有带来应有的正面效应[12-13];张明辉等也认为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福利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14]。另一方面,翟黎明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考察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状况的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后农户的自然资本下降明显[15];不同生计策略类型[16]和不同家庭结构[17]的农地转出户之间生计资本状况差

收稿日期:2017-06-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农民工家庭生计转型: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7167330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 年度博士生科研创新项目"Scoping Study 在进城农民工家庭生计转型研究中的应用"(2017B1010)。

作者简介:全　磊(198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通讯作者:陈玉萍(1964-),女,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异显著;纪红蕾等的研究对比了农地转出户和未流转户的生计资本状况,研究表明总体上两类农户的生计资本大致相近[18];张会萍等的研究则表明土地流转减少了老年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不同类型老年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存在一定差距[19]。

对农地转出户生计状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颇具价值的成果,但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首先,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框架的福利隶属函数的设定,还没有成熟有效的方法,降低了福利评价的科学性;其次,收入是由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所决定的,且生计资本有着比收入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的外延,更能全面的刻画出农地转出户生计状况的复杂性,也更有利于辨别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是否可持续,所以考察生计资本比考察收入更有意义;最后,现有对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差异的讨论,多是对截面数据的静态分析,尚未考察土地流转前后各类农户生计资本差异的动态变化,也没有将土地流转导致生计资本流动的"净效应"分离出来。

要科学回应这些问题,除了要测算土地流转后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还需测算土地流转前和土地流转初期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然后考察生计资本的流动性特征。例如,丁士军等的研究利用农户土地征用前后两期数据,通过构建流动矩阵分析了失地农户的收入流动性特征[20],但还未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性分析。在农村土地流转实践中,土地流转前各类农地转出户是否已经存在生计资本的差异,土地流转后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差异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状况总体如何,不同生计资本组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状况有何差别,哪些因素影响了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流动方向等。本文将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湖北武汉市新洲区和襄阳市襄州区农地转出户的调研数据,构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流动矩阵,分析农户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为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改善找到抓手,为政府制定促进不同类型农地转出户生计转型的政策提供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分析框架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分析基础[21]。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描述了农户如何在外部风险冲击下,基于自身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实现生计转型的过程,体现了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生计资本状况决定了农户采用的生计策略类型,而生计策略的实施又会使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发生变化。该分析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自然资本指农户所拥有的或长期使用的土地、水和生物资源;人力资本指农户所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等;物质资本指农户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资本,包括房屋、耐用消费品、机械设备等;金融资本指农户可支配和筹措的资金,包括家庭的现金存款、亲朋间的无偿援助以及从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等;社会资本指农户的社交网络,包括家庭维护的社会交际圈和加入的协会组织。

土地流转前农户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土地流转作为一种外界冲击,必然会导致农户原有的生计资本状况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生计资本的流动。在土地流转初期,即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极短期,只有自然资本发生流动,这是土地流转造成的"直接效应"。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根据土地流转初期的生计资本优势制定生计策略,生计策略的实施又反作用于其生计资本,致使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差异化流动,这是土地流转带来的"间接效应"。两个阶段生计资本的流动合成了土地流转的"净效应",要将这种"净效应"分离出来,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需要采用相应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2.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有因子分析法、两步聚类法和有序 Logit 模型。首先,利用因子分析法测算农地转出户土地流转前、土地流转初和土地流转后这三个时期的生计资本水平,以数值的大小反映生计资本水平的高低。其次,利用两步聚类法识别农地转出户采用的生计策略,将农地转出户划分为不同类型。通过对比土地流转初期各类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分析其制定生计策

略的优势。通过比较土地流转前后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识别哪些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是由土地流转造成的,哪些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是在土地流转前就已经存在的。最后,构建生计资本流动矩阵,将土地流转的"净效应"分离出来,并利用有序 Logit 模型分析生计资本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3.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对农地转出户的调查。课题组于 2016 年 7 月在湖北武汉和襄阳选定自 2010 年以来大规模流转过土地的新洲区和襄州区作为样本取样区域,并在两个区各选一个土地流转较为典型的村,对两个村的农地转出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共收集到有效问卷 225 份。

新洲区吊尾村的规模经营主体于 2011 年与村集体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高达 81.25%的受访农户将农地全部流转,农地流转面积占受访农户承包面积的 88.46%。襄州区周垱村的规模经营主体先后于 2010 年和 2011 年与村集体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只流转划定范围内的农地,仅有 34.02%的受访农户将农地全部流转,农地流转面积仅占受访农户承包面积的 57.58%。对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状况的调查涉及三个时期:土地流转前、土地刚流转和土地流转后,这三个时期分别指土地流转的前一年、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极短期和 2015 年。

三、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测算与生计策略类型划分

1.生计资本测算

测算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主要涉及两个方面:指标选取和测算方法。指标选取参考了现有文献对生计资本指标的设计[22-24],结合研究区域实际,构建适用于本研究的生计资本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采用因子分析法测算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水平,为了能够直接比较三个时期的生计资本因子综合得分,先将三个时期的个案拼接在一起,并对每一类生计资本做因子分析,然后把每一类生计资本的因子综合得分按不同时期拆分,得到每个农户三个时期的各类生计资本因子综合得分。由于因子综合得分具有相对意义,其数值大小能够反映生计资本水平的高低,则既可以对同一时期不同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大小排序,又可以考察同一农户不同时期的生计资本变化。

在做因子分析前,首先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变量间量纲上的差异,然后对各类生计资本的变量组做因子分析适合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其 *KMO* 值均大于 0.5,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概率均为 0.000,这说明各类生计资本的变量组均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设定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0.8,选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使因子代表性更强,提取各生计资本的公因子个数为 3、3、5、2、3,累积方差贡献率均大于 73%。最后采用回归估计法得到因子得分函数系数矩阵,根据因子得分函数系数矩阵和标准化后的原始变量求解各公因子得分,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占累积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各类生计资本的因子综合得分。

表 3 列出了土地流转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因子综合得分的分布状况。从均值来看,土地流转前户均拥有的自然资本水平最高,金融资本水平最低;土地流转后户均拥有的金融资本水平最高,自然资本水平最低。从分散程度看,土地流转前农户间各类生计资本拥有量差异较大,土地流转后差异进一步扩大。

2.生计策略类型划分

已有文献根据农户的生计活动领域和家庭收入结构划分生计策略类型[16-17],但家庭收入结构本质上是农户实施生计策略的结果,并非生计策略本身,因此,从收入结构角度划分生计策略类型并不十分恰当。本文采用两步聚类分析法,从农户生计活动领域的劳动力投入角度,将土地流转后农户的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为四类,聚类结果如表 4 所示,不论是方差分析还是非参数检验的结果都显示,每个指标在四个类别中的分布差异显著。

通过比较四个类别间的指标均值,可以得出:本地农业打工人数、本地非农打工人数和外地打工人数在第一类中的均值最高,因此将第一类农地转出户采用的生计策略称为"打工型",此类农户共 120 户;未就业人数在第二类中的均值最高,因此将第二类农地转出户采用的生计策略称为"非劳动

型”,此类农户共44户;本地务农人数在第三类中的均值最高,因此将第三类农地转出户采用的生计策略称为“务农型”,此类农户共39户;本地非农经营人数和本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数在第四类中的均值最高,因此将第四类农地转出户采用的生计策略称为“兼业型”,此类农户共22户。

表1 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及总样本考察变量情况

资本类型	测量指标	含义	土地流转前	土地流转后
自然资本	自留农地面积	家中自留农地亩数	9.39	2.86
	转入农地面积	转入农地亩数	0.16	3.21
	转出农地面积	转出农地亩数	0.16	6.65
	闲置农地面积	家中闲置农地亩数	0.66	0.28
人力资本	户主受教育水平	文盲=0;小学=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及以上=4	1.33	1.33
	户主健康水平	非常差=0;比较差=1;一般=2;比较好=3;非常好=4	2.50	2.53
	家庭人均健康水平	家庭成员健康水平均值	2.73	2.68
	家庭人均教育水平	家庭成员教育水平均值	1.39	1.43
	劳动力占比	16至59岁家庭成员占比/%	0.65	0.54
	专业技能	无=0;有=1	0.10	0.16
物质资本	住房套数	拥有住房套数	1.08	1.12
	房屋面积	房屋建成面积/平方米	155.49	165.11
	地面材料	土、砖、石板、水泥=0;水磨、瓷砖、木板=1	0.12	0.16
	主要能源	柴草、沼气、煤=0;液化气、天然气、电=1	0.53	0.70
	饮用水来源	井水、河水=0;自来水、纯净水=1	0.44	0.54
	厕所类型	无厕所、旱厕=0;水冲式厕所=1	0.28	0.42
	耐用消费品数量	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照相机、电脑、热水器、摩托车、电动车、汽车/台	5.87	8.02
	农业机械数量	水泵、拖拉机、机动三轮车、整耕地机械、收割机械、脱粒机械、动力机械/台	1.21	1.52
金融资本	家庭纯收入	农业纯收入、非农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加总/元	30 396.15	46 512.11
	借贷出金额	无=0;(0,5 000]=1;(5 000,10 000]=2;(10 000,30 000]=3;(30 000,50 000]=4;(50 000,100 000]=5;100 000以上=6/元	0.01	0.03
	存款金额	[0,5 000]=1;(5 000,10 000]=2;(10 000,30 000]=3;(30 000,50 000]=4;(50 000,100 000]=5;100 000以上=6/元	1.95	2.05
社会资本	拜年户数	春节期间相互拜年走往的户数	12.07	13.58
	亲朋是村干部	无=0;有=1	0.13	0.12
	亲朋是企业老板高管	无=0;有=1	0.07	0.08
	亲朋在机关事业单位	无=0;有=1	0.20	0.21
	参加协会组织	无=0;有=1	0.09	0.10

表2 各生计资本因子分析适合性检验

项目	自然资本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KMO值	0.564	0.600	0.576	0.544	0.529
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	143.833	939.449	499.699	81.582	176.960
Bartlett球形检验(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公因子提取数	3	3	5	2	3
累积方差贡献率/%	84.738	75.402	78.055	76.762	73.207

表3 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因子综合得分描述性统计

生计资本	土地流转前				土地流转后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自然资本	0.352	0.480	3.084	−0.648	−0.173	0.549	5.404	−2.042
人力资本	−0.002	0.579	1.375	−1.159	−0.002	0.624	1.463	−1.257
物质资本	−0.078	0.417	1.331	−0.937	0.154	0.467	2.047	−0.839
金融资本	−0.082	0.643	5.069	−0.631	0.168	0.809	4.324	−1.346
社会资本	−0.021	0.562	2.442	−0.651	0.039	0.621	2.619	−0.757

表 4　土地流转后各投入指标在四类中的均值及差异分析

类别	本地务农人数	本地非农经营人数	本地农业打工人数	本地非农打工人数	本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数	外地打工人数	未就业人数
打工型	0.267	0.017	0.250	0.842	0.000	1.108	1.433
非劳动型	0.000	0.000	0.046	0.068	0.000	0.046	1.818
务农型	1.795	0.000	0.077	0.205	0.000	0.128	0.846
兼业型	0.455	1.227	0.091	0.046	0.273	0.091	0.909
F 值	88.22	121.60	3.63	14.41	17.09	23.19	6.51
显著性	0.000	0.000	0.014	0.000	0.000	0.000	0.000
卡方值	120.85	150.18	9.79	40.59	46.97	67.51	26.79
显著性	0.000	0.000	0.020	0.000	0.000	0.000	0.000

3.不同类型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比较分析

农地转出户基于土地流转初期的生计资本优势制定生计策略。由表 5 可知,每一类生计资本的因子综合得分在四个类别中差异显著。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最高的农地转出户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最低的农地转出户选择“非劳动型”生计策略;自然资本水平最高的农地转出户选择“务农型”生计策略,自然资本水平最低的农地转出户选择“打工型”生计策略。采用“务农型”生计策略的农地转出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均高于采用“打工型”生计策略的农地转出户,采用“打工型”生计策略的农地转出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高于采用“务农型”生计策略的农地转出户。

表 5　土地流转初期各类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比较分析

类别	自然资本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打工型	−0.27	0.13	−0.05	−0.03	0.02
非劳动型	−0.21	−0.56	−0.44	−0.45	−0.25
务农型	0.06	0.10	0.10	0.04	−0.14
兼业型	0.01	0.21	0.17	0.15	0.42
F 值	4.83	21.95	20.91	7.15	8.49
显著性	0.00	0.00	0.00	0.00	0.00
卡方值	20.35	51.15	51.90	45.48	34.25
显著性	0.00	0.00	0.00	0.00	0.00

下面考察土地流转前后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位序差异的变化。首先,采用方差分析和非参数检验,检测土地流转前后每一类生计资本因子综合得分在各类农地转出户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其次,当统计检验表明各类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水平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异时,将农地转出户的类型按照生计资本水平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位,本文将这种通过统计检验的排位结果称为“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最后,通过比较土地流转前后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识别哪些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是由土地流转造成的,哪些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是在土地流转前就已经存在的。

如表 6 所示,土地流转前,各类农地转出户的自然资本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四类生计资本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土地流转后,所有生计资本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对比土地流转前后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发现土地流转增加了各类农地转出户自然资本的位序差异,改变了金融资本的位序差异,但保持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位序差异,由此可知,土地流转后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并非全部是土地流转造成的。

生计总资本水平能够综合反映农地转出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测算生计总资本时考虑到五种生计资本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摒弃以往研究中简单加总五种生计资本的处理方法,借鉴 Liu 等通过计算生计五边形面积对五个生计资本维度集成的方法[25],分别测算土地流转前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水平。具体测算时,由于五种生计资本因子综合得分存在负值,为保证能够计算出生计五边形面积,采用数值平移法对五种生计资本因子综合得分进行非负处理,即选择平移 3 个单位。

表6 土地流转前后各类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比较分析

类别	自然资本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打工型	0.35	−0.27	0.13	0.18	−0.05	0.18	−0.03	0.34	0.02	0.18
非劳动型	0.26	−0.21	−0.56	−0.69	−0.44	−0.25	−0.45	−0.39	−0.25	−0.34
务农型	0.46	0.06	0.10	0.08	0.10	0.34	0.04	−0.07	−0.14	−0.19
兼业型	0.36	0.01	0.21	0.24	0.17	0.49	0.15	0.77	0.42	0.44
F 值	1.14	4.83	21.95	31.93	20.91	21.64	7.15	17.32	8.49	14.79
显著性	0.3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卡方值	9.79	20.35	51.15	64.55	51.90	49.28	45.48	84.12	34.25	48.13
显著性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使用该方法测算生计总资本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测算过程降低了生计资本内生性带来的影响。内生性体现在五种生计资本在生计五边形上的排位不同得到的面积也不同,对五种生计资本组成的所有生计五边形的面积求平均,以此降低生计资本内生性带来的影响。二是测算结果更符合生计资本构成对可持续生计结果的作用效果。生计五边形面积的大小取决于五种生计资本的分布状况,若农户的五种生计资本分布越均匀,则生计五边形面积越大,意味着测算出的生计总资本值越大;若农户的五种生计资本水平两极分化越严重,则生计五边形面积越小,意味着测算出的生计总资本值越小。

在得到农地转出户生计总资本水平的基础上,采用两配对样本T检验检测同类农地转出户生计总资本水平在两个时期的动态变化,考察土地流转前后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总资本位序差异的变化。如表7所示,横向来看,土地流转后打工型和兼业型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而非劳动型和务农型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显著减少。纵向来看,两个时期各类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土地流转改变了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总资本的位序差异。

表7 土地流转前后各类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比较分析

类别	生计总资本		
	流转前	流转后	*P*
打工型	95.49	98.01	0.03
非劳动型	73.43	68.79	0.00
务农型	97.77	93.22	0.02
兼业型	106.51	114.29	0.08
F 值	20.85	33.09	——
显著性	0.00	0.00	——
卡方值	68.06	89.98	——
显著性	0.00	0.00	——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土地流转致使各类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水平发生动态变化,下面本文将构建生计总资本流动矩阵并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将土地流转的"净效应"分离出来。

四、生计资本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

1.生计总资本流动性分析

参考丁士军等[20]构建收入流动矩阵的方法,首先将土地流转前和土地流转后的农地转出户生计总资本值分别从低到高排序,然后按照10%、10%、20%、20%、20%、10%、10%的比例确定低生计资本组(最低等级、低等级)、中等生计资本组(中等偏低等级、中等等级、中等偏高等级)和高生计资本组(高等级、最高等级)三个组七个等级。若农地转出户土地流转前后的生计总资本位于不同的生计资本等级,则说明生计总资本出现动态变化。按生计总资本的流动方向将农地转出户生计总资本流动类型分为五类:上升、上稳、不变、下稳、下沉。"上升"和"下沉"表示组间的流动,"上稳"和"下稳"表示组内等级间的流动,"不变"表示没有流动。具体来说,"上升"代表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从低生计资本组流向中等生计资本组或高生计资本组,或从中等生计资本组流向高生计资本组;"上稳"代表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所在组没变,但等级有所提升;"不变"代表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所在组和等级都没变;"下稳"代表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所在组没变,但等级有所下降;"下沉"代表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从高生计资本组流向中等生计资本组或低生计资本组,或从中等生计资本组流向低生计资本组。

不同生计资本组生计总资本流动矩阵如表 8 所示,总体来看,生计总资本趋于"不变"的农户比重最高。分组来看,相对于中等和高生计资本组,低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更倾向于向上流动;相对于低和中等生计资本组,高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更倾向于向下流动。不同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性出现分化,分组考察生计总资本流动性的影响因素是有必要的。

表 8　不同生计资本组生计总资本流动矩阵　　%

土地流转前	土地流转后				
	上升	上稳	不变	下稳	下沉
低生计资本组($N=46$)	23.91	13.04	56.52	6.52	0.00
中等生计资本组($N=133$)	10.53	21.80	37.59	21.80	8.27
高生计资本组($N=46$)	0.00	10.87	47.83	10.87	30.43
合计($N=225$)	11.11	17.78	43.56	16.44	11.11

2.**模型设定**

本小节考察土地流转前生计总资本因素、生计策略因素和区域因素对农地转出户生计总资本流动性的影响。因变量y_i为生计总资本的流动方向,赋值下沉=1,下稳=2,不变=3,上稳=4,上升=5,是一个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可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或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假定误差项服从的分布不同。由于本文使用的部分数据并不满足标准正态分布的条件,故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更为合理,模型可表述如下:

$$y_i^* = X_i\beta + u_i \tag{1}$$

式(1)中,y_i^*是y_i对应的潜变量;X_i为一组自变量,代表由X_{1i}、X_{2i}、X_{3i}组成的矩阵,其中X_{1i}代表土地流转前农户的生计总资本因素,X_{2i}代表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因素,X_{3i}代表区域因素;β为待估计参数;u_i为服从逻辑分布(Logistic distribution)的误差项。y_i与y_i^*存在如下关系:

$$y_i = \begin{cases} 1, y_i^* \leqslant \gamma_1 \\ 2, \gamma_1 < y_i^* \leqslant \gamma_2 \\ \vdots \\ m, \gamma_{m-1} < y_i^* \end{cases} \tag{2}$$

式(2)中,$\gamma_1 < \gamma_2 < \cdots < \gamma_{m-1}$,是通过估计获得的阈值。给定$X_i$的值时,$y_i$取每一个流动方向的概率如下:

$$\begin{cases} P(y_i=1|X_i) = P(y_i^* \leqslant \gamma_1|X_i) = P(X_i\beta + u_i \leqslant \gamma_1|X_i) = F(\gamma_1 - X_i\beta) \\ P(y_i=2|X_i) = P(\gamma_1 < y_i^* \leqslant \gamma_2|X_i) = F(\gamma_2 - X_i\beta) - F(\gamma_1 - X_i\beta) \\ \vdots \\ P(y_i=m|X_i) = P(\gamma_{m-1} < y_i^*|X_i) = 1 - F(\gamma_{m-1} - X_i\beta) \end{cases} \tag{3}$$

式(3)中,$F(\cdot)$为分布函数。

3.**估计结果**

低生计资本组的因变量为四种生计总资本流动类型:下稳=1,不变=2,上稳=3,上升=4。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低生计资本组只涉及三种生计策略类型,以非劳动型为参照组,务农型和打工型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方向为"上升"的概率分别是参照组的 7.31 倍和 8.49 倍,打工型生计策略最有利于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以周埠村为参照组,吊尾村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方向为"上升"的概率是参照组的 5.19 倍,表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状况是存在地区差异的,可能源于:(1)吊尾村位于武汉市近郊,交通发达,农地转出户拥有外出就业的便利条件和更多的打工机会,而周埠村不是襄阳市近郊,非农就业机会不多,显然省会近郊更有利于农地转出户的择业和发展;(2)吊尾村的土地流转程度远高于周埠村,这意味着土地流转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

中等生计资本组的因变量为五种生计总资本流动类型:下沉=1,下稳=2,不变=3,上稳=4,上升=5。以非劳动型为参照组,务农型、打工型和兼业型的生计总资本流动为"上升"的概率分别是参照组的 4.61 倍、11.97 和 31.44 倍,兼业型生计策略最有利于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以周埠村为参照

组,吊尾村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方向为"上升"的概率是参照组的2.68倍,这再次表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性是存在区域差异的。

高生计资本组的因变量为四种生计总资本流动类型:下沉=1,下稳=2,不变=3,上稳=4。高生计资本组只涉及三种生计策略类型,以务农型为参照组,打工型和兼业型的生计总资本流动为"上稳"的概率分别是参照组的4.56和6.74倍,兼业型生计策略最有利于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相较于周垱村,吊尾村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状况更好,这表明区域因素对生计总资本流动性的影响具有一致性,不因农地转出户所在的生计资本组而发生改变。

表9 不同生计资本组生计总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Logit回归结果

变量	低生计资本组		中等生计资本组		高生计资本组	
	回归系数	风险比	回归系数	风险比	回归系数	风险比
生计总资本	0.083	1.087	0.008	1.008	0.020	1.020
务农	1.991*	7.319	1.529**	4.613	——	——
打工	2.139***	8.494	2.483***	11.974	1.519*	4.569
兼业	——	——	3.448***	31.444	1.909**	6.746
区域	1.648*	5.197	0.988**	2.686	1.366*	3.922
Prob>chi2	0.003		0.000		0.053	
Log likelihood	−42.77		−176.71		−50.40	
Pseudo R^2	0.161		0.099		0.085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1.结 论

本文利用湖北省新洲区吊尾村和襄州区周垱村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流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1)土地流转后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并非全部是土地流转造成的。(2)生计总资本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户比重最高,低生计资本组和高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流动状况发生分化。(3)带动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有打工型生计策略、兼业型生计策略及位于省会近郊的有利位置。(4)生计策略选择受到土地刚流转时期的生计资本禀赋约束。生计资本积累最低的农地转出户只能被动选择非劳动型生计策略,致使其生计资本状况进一步恶化,成为土地流转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务农型农地转出户受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约束,无法选择打工型和兼业型生计策略。

2.政策含义

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要为农地转出户创造良好的非农就业环境。由于打工型和兼业型生计策略更有利于生计总资本流动,因此政府应为农地转出户提供短期有效的非农职业技能培训,促进打工型和兼业型农地转出户顺利转型。第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较低的土地流转程度限制了农户劳动力的自由配置,低水平的生计资本积累对非劳动型农地转出户外出就业产生"枷锁效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和劳动力有极大需求,从而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地转出户的双赢,地方政府可以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农地转出户就业数量和成效作为财政支农资金和项目审批的参考依据。第三,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促进农地转出户生计转型。交通发达、就业机会丰富的区域因素更有利于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流动,政府应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加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地转出户生计转型提供便利条件。

参 考 文 献

[1]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0(2):54-65.

[2] BESELEY T.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3(5):903-937.

[3] FEDER G. The relation between farm size and farm productivity:the role of family labor,supervision and credit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5,18(2):297-313.
[4] 冒佩华,徐骥.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J].管理世界,2015(5):63-74,88.
[5] 王春超.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 17 省份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1):93-101.
[6] 李中.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基于湖南邵阳市跟踪调研数据的研究[J].经济地理,2013(5):144-149.
[7] 陈飞,翟伟娟.农户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诱因及其福利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5(10):163-177.
[8] 刘远风.土地权利与农村空心化治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4(5):63-69.
[9] 钱忠好,王兴稳.农地流转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6(10):39-50.
[10] 杨子,马贤磊,诸培新,等.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变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5):111-120.
[11] 韩啸,张安录,朱巧娴,等.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农户最优经营规模研究——以湖北、江西山地丘陵区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3):368-373.
[12] 游和远,吴次芳,鲍海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农地转出户福利——来自黔浙鲁农户的证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3(3):16-25,110.
[13] 郭斌,李漫.农地经营权流转中农地转出户福利的变化——以西安周边地区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16(10):511-515.
[14] 张明辉,蔡银莺,朱兰兰.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6(3):387-394.
[15] 翟黎明,夏显力,吴爱娣.政府不同介入场景下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 PSM-DID 的计量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2):2-15.
[16] 朱建军,胡继连,安康,等.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6(2):49-58,111.
[17] 苏扬帆.土地流转背景下家庭结构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研究[D].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25-33.
[18] 纪红蕾,蔡银莺.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 516 户农民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7(2):220-226.
[19] 张会萍,胡小云,惠怀伟.土地流转背景下老年人生计问题研究——基于宁夏银北地区的农户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6(3):56-67.
[20] 丁士军,杨晶,吴海涛.失地农户收入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6(2):116-125,128.
[21] CARNEY D. Implement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in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what contribution can we make?[M]. London: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1998:34-58.
[22] SHARP K. Measuring destitution: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R]. IDS working paper,2003:11-22.
[23] 黎洁,李亚莉,邰秀军,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9(5):29-38,96.
[24] 丁士军,张银银,马志雄.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J].农业经济问题,2016(6):25-34,110.
[25] LIU Y,XU Y. A geographic identif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alysis[J].Applied geography,2016,73(8):62-76.

(责任编辑:陈万红)